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黄 权 生¹, 杨 光 华²

【摘 要】：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 60%，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

【关键词】：四川；移民地名；湖广填四川

【中图分类号】：K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5)03-0111-08

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移民史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1]。地名可以较直接反映移民空间分布，既可悟又可视，能指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从地名可透视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2]。因此地名变迁中移民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地名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移民本身的变迁状况[3]。在任何时候，地名标志着某一个时代，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4]。“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地名中有较强的反映。本文以原四川(含今重庆)行政区域为范围，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地名进行探讨。在我国古地名中，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名有史可证、有章可据，而今县级以下的镇、乡级及乡级以下的地名则文献记叙相对较略，甚至没有记载。在明清之际，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据研究，动乱之后，整个四川只剩下 50 万人左右[5]。由于居民的剧烈减少，甚至整乡整村的消失，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大量的明清移民情况，地名成为“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

笔者以 20 世纪 80 年代原四川省编修地名录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按时间划分为明代移民地名和清代移民地名。明代移民地名如：荣县文昌乡伍家冲“元末明初，荣境多为湖广人流迁入籍谋生，此为伍姓占地，故名”[6]。清代移民地名按移民信息分为三个层次，清代一级移民地名：其地名信息中移民籍是非四川籍，注明移民后所在地及命名缘由。如垫江县谢家坪：“湖广进四川，姓谢的在此为业。”[7]二级移民地名：此类地名没有移民来源地，时间是明之后，或是没有时间信息但有插占、迁移信息，其地名是移民而产生的则为二级移民信息。如：北碚区马家沟“清初，马家迁此沟内定居，故名”。北碚区东阳乡袁家湾：“袁家迁来此湾定居，故名”[8]。三级移民地名：会馆地名，如：简阳县石桥镇江西街：“清朝时，迁居此地江西人建一会馆而得名。”[9] 另外还有其他相关地名，如反映明清战乱的与张献忠有关的地名，如：三台县八洞乡仁和桥：“传说，明末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此桥下二人未被杀，故名。”[10]及战乱后移民恢复经济的川主及城镇地名等，本文只作辅助参考。本文希望通过对四川移民地名的空间分布规律探讨分析研究，移民地名籍贯比较，以及移民地名蕴藏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动态信息试析，进一步认识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这个特殊历史时代。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

1黄权生(1977-)，男，重庆巫山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区域文化；

2杨光华(1959-)，男，四川三台人，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行政区划。

(西南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一、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探讨

笔者所凭借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各区(市)县地名录有 200 多个，不便一一列举，由于篇幅之限，四川移民地名数量众多，所含信息量大，非一文所能及，本文时间以清代为主着重分析整个“湖广填四川”移民地名分布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四川省和重庆直辖市相关地名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表 1 四川各级移民地名及相关地名统计表						
地 区 名	明代移民地名	清代一级移民地名	清代二级移民地名	会馆地名	川主庙地名	张献忠地名
成都地区	4	39	6	18	9	17
德阳地区	4	191	4	9	11	3
绵阳地区	9	32	15	6	20	10
遂宁地区	3	46	10	0	10	3
乐山地区	6	20	17	4	23	0
自贡地区	17	84	211	1	14	6
内江地区	11	273	51	3	23	11
南充地区	5	128	17	2	15	35
广安地区	1	23	4	0	9	0
巴中地区	8	9	5	0	9	9
达县地区	1	25	43	0	4	11
广元地区	0	1	0	0	3	1
宜宾地区	3	59	7	2	28	0
泸州地区	2	40	7	0	7	5
雅安地区	14	2	10	1	2	7
凉山地区	23	67	112	0	1	0
渡口地区	0	5	0	0	0	0
阿坝地区	0	3	8	0	1	0
甘孜地区	0	0	2	0	1	0
万县地区	6	86	22	3	71	14
涪陵地区	10	27	11	0	16	14
重庆地区	33	182	158	10	37	15
总 计	160	1344	720	59	314	161

说明: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 80 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今还没有编录地名录，笔者以合川方志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其中缺城口县、峨边县、得荣县、炉霍县、龙泉驿区，一共有 211 个县(缺 5 区县)。除重庆、万县、涪陵地区政区以 80 年代市或地区为统计区划以及今眉山市含原乐山地区，资阳市在内江地区统计外，其余按今天行政区划统计，其中遂宁地区原为绵阳地区，绵阳地区的广元、旺苍、剑阁、青川加上南充的苍溪县成立广元市单独统计。大英县为后增设县，80 年代所统计地名录故无。

如表 1 所示明代移民地名 160 个，清代一级移民地名共有 1 344 个，二级移民地名共 720 个，会馆地名 59 个，一共有移民地名 2 283 个，以统计的 206 个区(市)县求平均数为县均 11 .08 个。地名是时代的标志，是历史的见证，陈正祥先生认为地名不仅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更能反映古代民族迁移或征战的痕迹，是文化遗产，有似化石，有文化层的指标作用 [11]。葛剑雄先生认为：“在原始地名出现大规模的、系统的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地名学方法)就 更加有效，有可能据此复原整个移民过程。” [12] 表 1 是整个四川移民地名总概，并不能直观看出其分布规律，下面表 2 就可较直观的看出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表2 四川省区县中移民地区超过平均数的统计表

重庆直辖市 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嘉陵江流 域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沱江流域区 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川西平原区 县	移民地名总数
奉节县	26	遂宁县	26	泸县	24	青白江	16
云阳县	43	安岳县	24	宜宾县	39	德阳县	53
万县(市)	23	乐至县	31	富顺县	94	广汉县	137
巴县	73	蓬溪县	29	隆昌县	29	市中区	15
江津县	25	南充县	18	威远县	54	总计	221
永川县	33	南部县	56	内江县	19		
荣昌县	40	仪陇县	54	荣县	218	川西高原区	移民地名数
璧山县	23	三台县	33	资中县	66	宁南县	12
合川县	17	开江县	43	资阳县	17	盐源县	12
北碚区	84	安县	18	简阳县	98	西昌县	38
南桐区	19	邻水县	14	中江县	14	德昌县	38
涪陵县	13	仁寿县	13	总计	672	汉源县	20
南岸区	13	营山县	12			会东县	87
总计	432	总计	371			总计	207

说明：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 80 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今还没有编录地名录，笔者以合川方志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其中万县含万县市，叙永县有 12 个，没统计到表上。为统计之便，其中几个县是跨区域(流域)或两区域之间如中江县、开江县、蓬溪县、安岳县、乐至县等，宜宾县不属沱江流域。

上述重庆直辖市 13 区县有 432 个，占了所统计的重庆直辖市 40 区县(缺城口)548 的 79 %;会东县、宁南县、盐源县、西昌县、德昌县、汉源县 6 县共 207 个移民地名，是雅安地区、凉山地区、渡口地区、阿坝地区、甘孜地区 60 余区县川西高原及峡谷山区 246 个移民地名中的 84.15 %;上述 47 个区县一共有移民地名 1 682 个占 206 个县级所统计移民地名 2 283 个的比例达到 73.67 %，上述县均 35.8 个，其他许多县只有几个，甚至没有，其中阿坝地区 13 县才 11 个移民地名，1 县不足 1 个，甘孜地区 18 县一共才 2 个移民地名。大大低于 11.08 个县均移民地名数。整个大四川各地区移民地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差距呢？下面结合表 1 和表 2 分析其成因。

首先，明清战乱多、持续时间长的地区，人口耗损大，地名更替较多，移民地名就多。其中人们对“八大王屠四川”之说是妇孺皆知，今所见县志及家谱也都有记载。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引《蜀碧》“崇祯十二年八月，张献忠寇蜀，官军败绩于汤家坝”。族谱载“经献贼之乱，避难返楚，清初复来蜀，仍居故土”[13]。潼南《萧氏族谱》《入川各支脉派氏考》：“明末清初，时代变迁，崇祯十七年甲申岁，西蜀之道八大王张献忠，兵焚烟灭……(清初)吾族随令入川……”[14]涪陵县城郊黄旗口：“明末，张献忠义军经此，曾在河边插黄色军旗，故名。”藿市老房子：“传说此房屯驻过张献忠的义军。”[15]前面笔者已讲到张献忠义军并没有乱杀人，但战争必然使人口耗损，故有：“相传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此与官军激战，双方及百姓死亡上千人，故名。”[16]明清战乱地名很多，笔者统计与张献忠有关地名 161 个，其分布全在张献忠大西军主要活动的区域，重庆直辖市现有 43 个与之相关地名，成都平原及周边有 40 余个，南充地区 7 县就有 35 个，县均最高。故有“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戮流换，土著稀简”[17]。巫山县“土著人甚鲜”[18]等说法。任乃强先生称：“至顺治七年时，蜀人大体已尽……叙、泸、重、涪、万、遵义与松、茂、雅州保宁一带，略有人迹而已。”[19]而大量移民地名对战争的破坏和人口耗损有较强说明。如：江津李市熟田沟“早年耕耘过，明末清初因兵患，荒芜，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故名。”[20]奉节河水田：“湖广填川此地无人烟，野兽在此喝水，谐‘喝水’为河水。”奉节蒿治坝：“明清时，湖广移民入川，此地荒无人烟，坝里长满蒿子，谐音得名。”[21]以上地名中所含信息，说明明清之际战乱对四川破坏是空前的。康熙年间陈祥裔《竹枝词》：“芳树烟笼闻豹啼，汉家陵寝草萋萋。”反映战乱后的环境状况故有：“崖悬青石接猫坪，一片荒山虎豹生。”在顺治三年“疫复有虎患，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不遗民，五年戊子大旱，群虎白日出游”[22]。而正是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造成“有可耕之田，而无种田之民”[23]。需要大量移民补充四川地区。胡昭曦先生认为移民入川动机有三，一是迁出地灾荒，而迁入地则有两点：首先是明末张献忠，残破四川后田园荒芜资源弃地，其次是巴蜀之富庶[24]。从上表 2 可看出移民地

名分布十分密集的川东、川中的沱江和嘉陵江流域及川西平原地区正是明清之际张献忠义军活动频繁地区，是战乱破坏的空前区域，也是移民集中地区，移民地名分布就必然多。

其次，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和平坝是移民迁移地首选。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其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由此可见移民迁移地选择趋向。从表一和表二可看出，川西平原和“嘉、涪、岷、沱”四江及长江沿江发达地区移民地名非常多，且相当的集中。德阳地区 5 市县 208 个，县均 41.6 个。川西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西南经济最发达地区，有“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之说，德阳县：“山原肥沃，有渔泽之利。”明清移民迁入量必然多。故德阳县有 52 个，广汉县有 137 个。内江地区 338 个，9 县市，县均 37.56 个。明代四川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成渝东大道形成，内江成为川东与川西交通的中枢[25]。自贡地区(自贡市、富顺县、荣县 3 县市)共 313 个，县均 104.33 个，为各地区单位量之首。自贡地区以产盐闻名于世，如富顺产盐“为全省盐场之冠”，形成“县境富饶甲于全省”的局面[26]。川东北地区山地约占总面积 80%左右[27]，因其地处大巴山，不利垦殖，故巴中地区 4 县才 14 个移民地名，广元地区 5 县才 1 个移民地名。

从一个区域横向比较也可看出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对移民选址的巨大影响。例如整个重庆直辖市地理空间横向看，重庆地区明代移民地名 33 个，一级移民地名 182 个，二级移民地名 158 个，会馆地名 10 个，合计 383 个。老重庆地区统计的 21 个行政区县，平均每区县移民地名 18.24 个，如果将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江北区作为整个大市区，与涪陵地区、万县地区统一统计口径，则平均每区县移民地名为 23.94 个；万县地区明代移民地名 6 个，一级移民地名 86 个，二级移民地名 22 个，会馆地名 3 个，合计 117 个。以 10 个行政区县计算，平均每区县 11.7 个；涪陵地区明代移民地名 10 个，一级移民地名 27 个，二级 11 个，合计 48 个，平均每区县 4.8 个。而老重庆市土地面积 22 341 平方公里，比万县的 29 483 平方公里与涪陵的 29 526 平方公里面积要少[28]。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区县平均值重庆地区一个地区比万县地区、涪陵地区移民地名多得多，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历代老重庆经济较万县、涪陵地区发达，自然条件优越，以丘陵平坝为主，水利耕作方便，人口承载量大，有较好的农业基础，人类活动的趋利性使后来的移民自然选择平坝缓丘开垦拓殖，容纳移民数量多，移民地名也就相对较多，聚居移民人口较多，因移民而命名的地名概率相应亦高，反观万县、涪陵地区，自然条件不如老重庆，不仅平坝缓丘较少，而且多高山、峡谷，不利灌溉，在移民吸纳量上就较少。巴县“水陆交通，商务繁盛……皆以本境为中心，而转输上下游各埠”[29]。故巴县一县有 73 个移民地名，而明代移民地名 15 个，清代一级移民地名 56 个，都居直辖市 41 区县之首。万县地区和涪陵地区行政区县数、土地面积、人口数量都几乎一样，最具可比性。前者 117，后者 48，相差两倍多，原因也在于前者较后者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云、开、万、梁等平坝地区在唐宋时期就是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承载量相对较多，该地又处于水陆交通线上，是入川门户，万县元代后一直是川东第二大港口，在明清时已成为川东商品第二大集散地[30]。另一方面，笔者前已讲到黔江地区明清战乱影响相对较轻，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区开发较晚，故较万县地区少则在情理之中。

川西南会东县、宁南县、盐源县、西昌县、德昌县 5 县共 187 个移民地名，其大都分布在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安宁河谷、邛海低地和长江沿岸。早在唐宋时安宁河冲击平原已有熟田地，故史载：“地宽广，多水泉，可灌粳稻。”[31]元代其地是“山清水秀，土广人稀，田地膏腴”[32]。乾隆时王廷取《盐源竹枝词》“收获无多岁亦荒，马蝗堡下别炎凉。县官不是栽花手，要垦山田种杂粮。”讲的是盐源官员带头垦殖情况。清郑知同《(宁远至雅州)途中竹枝词》：“越崙六日始经过，边徼由来弃地多。纵有良田皆汉姓，教他蛮子种高坡。”其注云：凡有平原大抵汉人占籍。

第三，交通便利是重要因素。从表 2 可看到自川江下游向上，有奉节县、云阳县、万县、涪陵县、南岸区、巴县、江津县、永川县、荣昌县、璧山县、宜宾县、泸县、会东县、宁南县都是沿江县市(区)或离江非常近的市场移民地名非常多，14 区县共 474 个移民地名，县均 33.86 个；非沿江的巫溪、开县、梁平、垫江、石柱、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南川、秀山、大足、綦江、铜梁 14 区县的移民地名为 62 个，县均 4.43 个。二者比较，沿

江的区县移民地名在非沿江地区的区县为 7.65 倍，二者差距甚大。当时移民拓荒垦殖，插占为业为主要目的，故清人陈谦《竹枝词》“五方杂处蜜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就是讲的移民垦殖，而交通便利易到达目的地是重要条件。这在移民地名释名中也是体现明显的，如巴县侯家堡：“清初，侯某移民入川在此堡插占为业故称。”巴县杨家湾：“清初湖广移民入川时，在此插占为生，故称。”巴县罗家湾：“清初，罗姓移民入川，在此插占为业，故称。”[33] 荣昌余家后湾：“清初，余姓从湖广来川插占此湾。”荣昌兰家坝：“清初，兰姓入川时插占此坝，名兰家坝。”荣昌何家大湾：“清初，何姓入川时插占此湾”等[6]。嘉陵江有北碚区、合川县、遂宁县、安岳县、乐至县、蓬溪县、南充县、南部县也是移民地名分布较多地区。原因同长江沿江区县，有嘉陵江之利也。清人张乃孚《巴渝竹枝词》“谁言蜀道青天上，百丈牵船自在游。”即言水道之便。即使邻水和开江县虽不邻江，但其近江，地偏南，是陆路要道。沱江流域有富顺县、隆昌县、威远县、内江县、荣县、资中县、资阳县、简阳县等是移民地名分布最多地区。清人顾印愚《府江棹歌》：“锦城南下寄篷舸，可爱磷磷石底江。行尽青衣三百里，白沙翠竹日推窗。”可见明清时成都东行多泛舟南下。黎小龙先生指出：“明末张献忠率数十万大军(以湖广籍为主)入川，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都主要由峡路(包括水道及沿江陆路)进入西南四川的。沿江上行，成为众多外省移民选择的 main 通道。”[34] 整个四川涪、沱、岷、嘉等河流为移民提供了交通方便。明代四川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成渝东大道形成，内江成为川东与川西交通的中枢[25]。沱江流域地处明清重庆和成都两大经济中心之间，而其水陆都十分畅通，不似川北有秦岭大巴山之阻，明清移民往返其间，移民活动更易在地名中沉积成为历史的见证。

第四，中心城区地名更替相对较快，移民地名非常少，而其郊县数量则激增，而到边远郊县又递减的趋势。这不仅体现在成都重庆大城市，中等城市也是如此。如泸州市才 1 个移民地名，而郊县泸县有 23 个；万县市有 5 个，郊县万县有 18 个；宜宾市 2 个，宜宾县 37 个；南充市 1 个，南充县 17 个；绵阳市 2 个，三台县 34 个；自贡市 2 个，富顺县 94 个，荣县 218 个。以整个老重庆市为讨论范围看：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江北区和九龙坡区的城区移民地名非常少，而其郊县的巴县、北碚、璧山则激增，再向郊县的铜梁、大足和长寿又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如原涪陵地区，城关镇无一移民地名出现，而城郊、龙潭坝、珍溪和蔺市区都各有三个移民地名。而到周边的整个丰都南川则仅有一、两个移民地名了。而其西南的彭水、秀山则几乎没有移民地名出现。其原因：首先是战乱后川东地区中心城市仍保留了一部分原明土著人口；其次是城镇人口流动大、各地人杂居、商业发达，地名更替相对较快，造成移民地名少；第三与移民主体的湖广移民的目的和其特点有关，当时官府招民拓垦，其主要是针对荒芜的农村。而湖广移民特点主要也是以占田地，开荒拓业为主，这种移民特点也造成市镇的移民地名相对较少，但中心城镇的郊县移民地名又特别密集，而再到边远区县则又降低呈三级分布趋势。这从会馆地名和川主地名也可看出城镇地名较农村更替更快。会馆地名主要分布在城镇如：江津县江西街“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郭以祖籍江西名街”。重庆市中区桂花园：“清末，此外有江西会馆，馆周围有桂花树，因此得名。”市中区陕西路六巷：“原名赣江街，因江西省会馆设此而得名，后改现名。”[35] 江北区浙江亭：“清代浙江省旅渝同乡在此修建会馆，馆前修有亭子。故名。”[36] 均在城区。清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另“三山馆本苏州式，不及新开四大园。”另“石狮称为石马巷，江南馆住宁波人”。所描述的会馆都在城市。川主庙则主要在乡村，綦江珍溪区回龙庙：“清乾隆时，建川主庙于象龙回转的小山冈上，故名。”城郊区行驰庙：“清代后期建的川主庙。”赶水区川主庙：“此处建有一庙，庙中塑有川主神像，故名。”[37] 康熙对陈祥裔《巴渝竹枝词》“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村”。其诗所讲川主祠(庙)是在“荒村”。笔者所统计川主地名 314 个，蓝勇先生所统计有 325 个川主会馆[38]，笔者所统计会馆地名 59 个，蓝勇先生所统计会馆 1400 个[25](p524)。蓝勇先生认为川主庙体现了古代乡土文化信仰及传承，是土著人口保留较多的结果。笔者认为移民对四川乡土信仰文化的认同，加速了移民(以及土著)彼此信仰的趋同性，打破了省籍间的阻碍，使四川文化得以整合，这种整合是建立在移民相互交流，经济交往频繁的基础上，反过来文化的认同又促进了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移民地名中移民的省籍统计分析

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 1038 个(含山东、青海、河北各 1 个)，湖广籍有 832 个(都含明代移民地名)占整个省

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80.15 %。广东 53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约 5.11 %。江西 51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4.91 %。陕西 23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2.22 %。四川 19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83 %。贵州 16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54 %。云南 12 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 1.16 %。由此可见四川移民是多省籍构成，一共有 18 个不同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算 2 省)，几乎包括清代所有省份。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另“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态多憨。”六对山人《锦》又称“北人馆异南人馆，黄酒坊殊老酒坊。仿绍不真真绍有，芙蓉豆腐是名汤。”都描述了四川各省移民杂处省籍众多的情形。其中省籍移民地名多者为湖广和广东及江西三地移民，与曹树基先生所认为的人口多者省份相同[39]。故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从这里也可证明从四川地名研究四川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是有一定的客观性。湖广籍移民地名最多，占了绝大多数。而其他省籍分布也相对集中，一些省籍移民地名少，但几乎分布在一个区域。下面参照各省籍移民地名列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蓝勇先生在研究影响移民籍贯地理分布的地理和社会因素有三点：一是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一是移民来源的社会历史因素；一是移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25] (p57)。

四川省(含重庆直辖市)区县地名录中注明移民省籍的移民地名统计如下：

表 3 四川省各地区省籍移民地名统计表

地 区	湖广	江西	广东	陕西	贵州	云南	福建	浙江	四川	西蕃	河南	山西	江南	孝感	湖北	湖南	总计
成都市	12	8	3	5	0	1	0	0	2	1	3	1	2	0	0	0	38
德阳市	71	5	3	5	0	1	0	0	0	0	0	0	0	3	0	0	85
绵阳市	38	1	7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
内江市	231	5	8	2	3	0	3	0	4	0	0	1	0	0	1	1	257
南充市	124	3	7	1	0	0	0	0	0	0	0	0	0	2	1	0	135
乐山市	12	3	5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1
达县市	31	0	1	0	0	0	0	0	4	0	0	0	0	1	0	0	36
自贡市	7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4	72
泸州市	9	1	2	0	3	0	0	1	0	0	0	0	0	0	0	0	16
宜宾市	36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1	0	39
渡口市	0	2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4
雅安市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凉山州	2	7	6	0	5	8	1	2	2	4	0	0	3	0	1	0	40
阿坝州	0	0	0	1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4
甘孜州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2
重庆市	103	7	5	1	5	0	1	1	2	0	1	0	0	1	3	1	126
万县市	67	3	3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75
涪陵市	26	4	0	0	0	0	0	0	2	0	0	0	0	1	0	4	32
总计	832	51	53	23	16	12	6	5	19	7	4	2	5	9	11	10	1035

以上资料来源于四川省八十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除外)，其中缺城口县、峨边县、得荣县、炉霍县、龙泉驿区，一共有 211 个县(缺 6 区县)。以上各市或省辖地区均简记为某某市，政区以八十年代市或地区为统计行政区划与表 1 略有不同，甘孜州还有青海籍一条，成都市有山东、河北各一条没有列入表格。孝感(含麻城)、湖北、湖南籍为湖广籍重复统计，故不记入有省籍贯移民地名统计总数。

川西平原和德阳、绵阳地区省籍移民地名，三市有 174 个有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籍有 121 个，所占比例为 69.54 %;陕西籍 15 个，所占比例为 8.62%，占整个陕西籍 23 个的 65.22%;江西籍 14 个，所占比例为 8.05 %;广东籍 13 个，所占比例为 7.47%。有 12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川东北(原 80 年代南充达县地区，含今天广元、广安、巴中)省籍移民地名，有 171 个，湖广籍有 155 个，所占比例为 90.64%，广东籍 8 个，其余都不足 5 个，四川 4 个，江西 3 个，陕西 2 个。有 5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川中地区(原内江地区, 含今自贡、资阳市)省籍移民地名 329 个, 湖广籍 301 个, 所占比例 91.49%, 广东籍 9 个, 江西 5 个, 四川 4 个, 陕西 3 个。贵州和福建各 3 个。有 8 个省籍移民地名。

川东地区(今重庆直辖市)有省籍移民地名共 230 个, 湖广籍 196 个, 占比例的 85.22%, 江西 14 个, 广东籍 8 个, 贵州 5 个, 四川 4 个, 陕西 2 个, 浙江 2 个, 河南 1 个, 福建 1 个。有 9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川东南地区(含宜宾、泸州、乐山市)省籍移民地名 76 个, 湖广籍 57 个, 所占比例 75%, 广东籍 8 个, 江西 4 个, 贵州 6 个, 云南 1 个, 四川 1 个, 浙江 1 个, 福建 1 个。有 8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川西南和川西北高原(含凉山、甘孜、阿坝州, 雅安和渡口市)省籍移民地名 53 个, 湖广籍 2 个, 所占比例不足 4%, 江西 11 个, 所占比例 20.75%; 云南 9 个, 所占比例 16.98%; 广东籍 8 个; 西蕃 6 个, 全川一共 7 个西蕃籍, 此居 6; 贵州 5 个; 江南 3 个, 全川一共 5 个江南籍此居 3; 四川 3 个, 陕西 2 个, 浙江 2 个, 福建 1 个。青海 1 个, 有 12 种不同省籍移民地名。

湖广籍最多, 有 832 个, 占整个明清省籍移民地名 1 038 个比例的 80.15%, 川东北、川中、川东地区最为集中。蓝勇先生研究指出明代 160 个移民地名应当作为土著人口计算, 笔者所查明代 160 个移民地名绝大多数是湖广籍, 这样计算清代湖广籍所占比例为 76.51%, 广东籍为 6.04%, 江西籍为 5.82%, 陕西籍为 2.62%, 但对湖广籍的主体地位影响不大。清人对湖广移民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有记叙, 如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 课雨占晴半楚人。”乾隆时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气候不齐连六诏, 土音错杂半潇湘。”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楚歌那得多如许, 半是湖南宝老官。”笔者所见四川竹枝词惟有湖广籍有半楚, 半潇湘之说。在清人直观看来湖广籍在整个四川移民中当在 50% 以上, 而川东、川中近楚其比例更高, 胡昭曦先生据族谱和采访资料得出合川 107 个族氏中有 80 个是湖广籍 [24] (p161), 占合川的 75%; 曹树基先生认为湖广籍在川东几近 80%, 全川则为 60% [39] (p100); 张国雄、梅莉以氏族比较研究认为“川东湖广籍为 62%, 川中为 56%, 川西为 53%” [40]。学界所统计的是明清两代湖广籍移民比例, 而蓝勇先生认为对清代湖广移民在川东应占半数以上, 而全川清代湖广籍为 35% [38] (p271), 虽显偏低但应是清代湖广籍移民比例底线。

湖广籍移民地名比例偏高原因: (1) 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绝大部分移民是湖广籍, 明玉珍所率将士几乎全是湖北籍故有“以随州明玉珍……在蜀有治行, 凭借乡谊, 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明初“洪武中, 平明玉珍, 以楚入川, 故蜀人多麻城籍” [41]。郭声波先生所绘明初、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形势图, 明初绝大部分是在湖广范围 [42]。(2) 明初湖广省面积比今湖北湖南二省大的多, 其行政区域包括今天贵州、广东等区域, 可能明初移民后祖籍认同仍为湖广, 明代绝大部分是来自湖广, 加上清初“湖广填四川”一半以上是湖广籍二者叠加, 湖广籍其比例就在 50% 以上, 以至明清两代移民地名达 80.15%, 整个湖广籍占五分之四强。(3) 从移民本身来说, 在湖广籍是主体移民情况下, 其他省籍移民将祖籍假称(误传)是湖广也是可能的。民间所传“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其本身也为其他省籍误认为是湖广创造了条件, 其他省籍移民大多沿长江水路入川, 大都会滞留湖广一段时间, 这为误记省籍创造了机会。(4) 移民是二次移民, 其他省籍移民湖广后, 再移民四川, 其溯省籍大都为湖广。如笔者收录《孙氏家谱》序曰:“……有巫邑(巫山)而上溯麻城, 由麻城而上溯江西远绍……”谱例曰:“……由江西衍湖广, 继继承承固非一世一代而已矣, 然前代失传勿弗言矣, 而宾公自湖广入川, 定孙氏始基之祖, 今谱中所录, 故宾公为断。”以“宾公为断”, 宾公后代溯祖籍必“自湖广入川”。就如“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一样, 笔者听现在孙氏后代所讲祖籍是麻城孝感而非江西远绍。笔者收录《谭氏族谱》序:“……所历江西河南而及湖广未阳……逢春公于国朝定鼎之初, 由未入蜀, 插业璧江城西, 迄今二百有余岁矣。”其后所讲支系均言自湖广入川, 笔者舅家《袁氏家谱》:“袁姓祖始由江西袁州迁于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洗脚河黄土坎, 明时又迁大昌起阳坝而基业焉。时起阳坝之有袁氏由此始也。”整个袁姓均言“湖广填四川”不知有“江西填湖广”也。(5)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泛指而非一定特指湖广移民四川, 在地名释名中也有体现, 如: 永川永郊广东院子:“传说, 清初湖广移民四川时, 此院为广东人居住, 故名。” [43] 笔者 2003 年 7 月在巴中通江八家坪也听到当地老人将陕西移民四川讲成清初“湖广填四川”。这些原因造成其他省籍皆称“自湖广入川”或“湖广填四川”。湖广籍占全川一半以上无疑义。总的来看, 明清两代籍贯

移民地名 80.15%，清代为 76.51%，湖广籍都占绝对优势。应考虑到湖广移民多为农业移民，形成地名的概率要大得多。鉴于以上缘由，清代湖广籍比例可下调 16-17 个百分点，在 60% 左右。下面探讨移民籍贯地理分布的特点。

首先，我们看四川移民地名中地理位置反映的距离递减规律，湖广籍有 832 个所占比 80.15%。这湖广(湘鄂)距四川有地利之便，外辅以长江水道交通之利有关。前面讲到交通便利是移民地名分布多寡的重要因素，在这里也是湖广籍占绝对优势的重要原因。川西平原和德阳、绵阳地区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籍有 121 个，所占 174 个有省籍移民地名的比例为 69.54%；较川中 91.49%，川东北 90.64%，川东 85.22%，都低得多。宜宾、泸州和乐山地区湖广籍所占比 75%，较川中 91.49%，川东北 90.64%，川东 85.22%也要低。川西高原(含凉山、甘孜、阿坝州，雅安和渡口市)省籍移民地名 53 个，湖广籍才 2 个，所占比例不足 4%，反观云南 9 个，所占比例 16.98%，仅次江西居第二；而川西成都平原和德阳、绵阳地区有陕西籍 15 个，所占比例为 8.62%，仅次于湖广籍，占整个陕西籍 23 个的 65.22%，四川成都地区相比较而言，因地理及地缘文化近陕西的缘故，陕西籍比例很高，故清末吴好山《成都竹枝词》：“秦人会馆铁桅竿，福建山西少者般。”今重庆直辖市和凉山州各有贵州省籍的移民地名 5 个，川西南地区的泸州和乐山各 3 个，川中地区 3 个，16 个移民地名全在毗邻贵州的区县附近，而川西和川东北 1 个都没有，这都体现了距离递减规律。从上面分析与学界各省移民地理分布成果基本一致。即：1. 川西和川西南湖广移民较少，如：成都、德阳和绵阳地区为 69.54%，宜宾、泸州和乐山地区为 75%，而凉山、甘孜、阿坝州，雅安和渡口地区仅 4%。2. 川西和川西北陕西移民较多。3. 川东地区湖广移民占大半以上，广东和福建移民较少，而贵州移民相对较多[27] (p271)。

第二，移民来源的社会历史因素，四川文化与湖广文化比较接近，《华阳国志·巴志》叙：“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今人学者研究巴楚文化由于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战争引起文化交汇，通婚造成民族融合，习俗相近形成文化认同，形成了巴楚文化[44]。此为人和；在当时清招募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垦殖，政府鼓励改土造田，山地垦荒，有四川“康熙复垦”和“乾嘉续垦”之说[42] (p102-109)，而湖广移民擅长种植，尤其开荒，此为天时。故康熙巴县陈祥裔《竹枝词》：“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清初湖广移民真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故其移民所占比必然独领风骚。如：开县岳溪区田冲子：“湖广入川时唐姓将一片荒地开辟成一冲田故名。”[45] 酉阳上下百地：“据辰州人(湖南)迁此，当地人送给他一坡荒地开垦，称为百地。”[46] 反观江西移民地名中绝大多数以经商开店为主。云阳云安镇江西街“清初，江西人在此街经商故名。”[47] 江津油溪区江西街：“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郭以祖籍江西名街。”[20] 酉阳兴隆场：“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生意兴隆故名。”[46] 重庆直辖市 14 例江西移民地名释名中从事商业与开店占了 9 例，超过一半以上从事非农业。也正与江西商人擅长经商相符。清中期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体现了江浙与江西人擅于经商，故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才会写出：“银色从来有定腥，元丝九五递加开。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认纹银是水汀。”

第三，移民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前面讲到湖广籍移民以从事种植业为主，江西经商见长，在移民地名分布上，湖广籍则多居丘陵和台地的沿江等区县，而江西、福建、浙江籍则居城镇。江西籍移民地名如云阳云安镇的江西街、酉阳兴隆场、江津油溪镇江西街等地名，福建籍移民地名如沙坪坝茶亭。重庆广东籍 8 例移民地名，除云阳上广、奉节下广地名外，其余都在永川和荣昌附近，如永川的广东院子，荣昌的骑龙穴、广东坡，江津的广东湾，璧山的广东子等。据学者研究认为，广东移民多迁入川南地区，因盆地南部更适宜于种甘蔗和荔枝，永川地区与川南地区毗邻[48]，《华阳国志·巴志》：“江州县有荔枝园。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蜀志》江阳郡：“东接巴郡，北接广汉，有荔枝……”任乃强先生也讲到，江阳巴郡与巴东同属四川红盆地之长江河谷，均在北纬三十度以南，海拔三百公尺左右，全年无霜雪，属亚热带气候，故物产大抵相同[49]。在古代重庆有荔枝园如汉晋重庆官荔枝园，宋元重庆荔枝圃，宋元合川荔枝阁，宋宜宾定夸山园，宋泸州西园，宋泸州杜园，宋泸州母氏园，宋雅安安乐园，唐宜宾荔枝园，宋在这些园内盛行荔枝宴[27] (p164)。到明朝时，荔枝完全退回到北纬 30° 线以南[42] (p287)，而广东移民择适宜其原籍农作物生长的北纬 30° 线以南的永川、江津等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由于移民趋利性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是各移民迁移地首选，富庶的成都平原尤为明显，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描写成都：“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据自注称康熙六十年成都旗人由湖北荆州迁入。

总之，四川移民地名分布在明清战乱多持续时间长人口耗损大的地区，移民入川都选择交通便利且自然条件优越平原和平坝丘陵地区，长江及其川中支流移民地名十分集中。移民主要主体湖广籍移民占到 60%左右，移民籍贯地理分布与移民的社会历史和移居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有关。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地名[J]. 中国方域, 1995, (4).
- [2] 司徒尚纪. 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 (1).
- [3] 张鸿奎. 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J]. 史林, 1995, (3).
- [4] 巴浩编译.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J]. 地名知识, 1983, (2).
- [5] 李世平. 四川人口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155
- [6] 四川省荣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荣县名录[Z]. 1982.
- [7] 垫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垫江地名录[Z]. 1983.
- [8] 重庆市北碚区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重庆市北碚区地名录[Z]. 1985.
- [9] 四川省简阳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简阳县地名录[M] . 1985.
- [10] 四川省三台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三台县地名录[Z] . 1986.
- [11] 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 · 台湾的地名—文化层分期[M].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1983:214.
- [12]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第一卷[M]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158.
- [13] 民国十八年简阳. 王氏初修族谱序[Z].
- [14] 萧杰生, 萧连山. 萧氏族谱资料[M]. 2003:8.
- [15] 四川省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Z]. 1985.
- [16] 万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万县地名录[M]. 1982.
- [17] 民国. 云阳县志: 卷 9[Z].
- [18] 巫山县乡土志: 卷 6[Z].
- [19] 任乃强. 张献忠屠蜀论[A] :111.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 · 张献忠在四川[C].

-
- [20] 四川省江津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江津县地名录[Z]. 1987.
- [21] 四川省奉节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奉节县地名录[Z] . 1982.
- [22] 道光. 重庆府志:卷 9[Z].
- [23] 清圣祖实录:卷 36[Z].
- [24] 胡昭曦. 巴蜀历史文化论集[C] . 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A]. 成都:巴蜀书社, 2002:177.
- [25] 蓝勇.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9.
- [26] 周询. 蜀海丛谈:卷上[M].
- [27] 蓝勇.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35.
- [28] 刘洪康.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M]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4.
- [29] 光绪. 巴县乡土志:卷下[Z].
- [30] 郑维宽. 论清代重庆在川东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2, (2)
- [31] 新唐书:卷 184. 杨收传[M].
- [32] 元一统志:卷 7. 建昌路[M].
- [33] 四川省巴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巴县地名录[Z] . 1983.
- [34] 黎小龙. 西南区域开发与社会史研究[Z].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49-50.
- [35] 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地名录[Z]. 1985.
- [36] 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区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区地名录[Z]. 1982.
- [37] 綦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綦江县地名录[Z]. 1986.
- [38] 蓝勇. 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M]. 成都:四川出版社, 1999:260.
- [39]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633.
- [40] 张国雄, 梅莉. 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J]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 (4).
- [41] 张国雄. 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23-24.

-
- [42] 郭声波. 四川历史农业地理[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84.
- [43]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Z] . 1987.
- [44] 林永仁, 来层林. 巴楚文化[M] .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15-21.
- [45] 四川省开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开县地名录[Z] . 1983.
- [46] 四川省酉阳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酉阳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录[Z]. 1984.
- [47] 四川省云阳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四川省云阳地名录[Z] . 1986.
- [48] 蓝勇. 清代四川省土著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5, (2).
- [49] 任乃强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注[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82 注释 5.

责任编辑 张颖超